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TRANSLATION

# 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 (1979—2019)

张莹/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 作品简介

本书系统梳理并研究了中国当代翻译学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成果及译学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宏观的全景式描述，突出每个阶段的重要学术事件、学术发展标志和学术研究主流，到近镜头的学术成果描述，介绍各阶段的代表性学者和专著，评述其当时及后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影响；同时也描述中国译学各发展时期的理论层次和研究视野，展现了当时学者们在译学观念上的论争以及中国译学走向独立过程中的曲折和艰难。最后对中国当代译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做出了展望。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 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

(1979—2019)

张莹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1979—2019 / 张莹著.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0.9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ISBN 978-7-310-05954-6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中国  
-1979-2019 IV. ①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49992 号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1979—2019)  
DANGDAI ZHONGGUO YIXUE FAZHAN SHI (1979—2019)

---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陈敬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http://www.nkup.com.cn>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0 年 9 月第 1 版 202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2 插页 251 千字  
定价：56.00 元

---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2018CBZZ011）

# 序

刘英凯

## 一、关于作者张莹博士

南开大学出版社以其卓然的学科慧眼，决定出版张莹博士的《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1979—2019）》。出版之前，接到张女史（古代对女性知识分子的尊称，此处借用）的邀请，让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张莹是我们深圳大学研究生点的第一届毕业生。我作为这一硕士点的负责人，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感慨万端。写了一首词：

柳梢青

（深大外语学院硕士点第一届硕士生毕业题词）

文苑繁秣，桃夭李秀，三度春风。

书山远望，寻幽探隐，魂梦攸同。

★★

共求学问圆通，引领处，万水浑融。

门内浓荫，墙头红杏，花影重重！

在我的心目中，后一句中的“墙头红杏”就是指张莹同学为首的二三杰出学子。张莹在三年的学习生涯中，以其快速的领悟力和清晰的理论思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她的毕业论文《〈菜根谭〉英译研究——从互文性角度看文化词语的理解与翻译》也是那

一届及各届毕业论文中的翘楚。张莹从我们硕士点毕业以后，考博进入了中国最好的两所外国语大学之一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上外，张莹在谢天振等名师的指导下，学术成绩日新月异。如今在毕业后短短几年内，就在声名卓著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获得副教授职称。通过阅读她的这本著作《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1979—2019）》，我更加感觉到她越来越深厚的学术功底。

## 二、关于《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1979—2019）》这部专著

透过纷披的枝叶，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1979—2019）》这颗学术大树的总体形象：它是属于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如社会学家卢曼（N. Luhmann）所说，翻译理论史是“对观察的观察”，这就需要理论史作者对史料最大限度地进行“观察”：尽可能巨细无遗地搜集，展现客观的理论视角，做出分门别类、纲维并举的梳理。在这方面，张莹博士做了一份杰出的工作。

这本专著把1979年左右开始的中国译学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作者把每个阶段各用一章的篇幅予以论列。我将结合张博士于2019年发表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三期的论文《1978—2018：中国译学发展的五个阶段和三个任务与挑战》，尽量要言不烦地对每一章的内容做出简明扼要的介绍：

### 第一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起步：1979—1984

张博士把中国译学的第一个时期节点设在1979—1984年，精炼总结了这一期间中国翻译学的关键起步点：翻译研究学术期刊阵地出现、译学研究群体形成、首次对翻译史和翻译思想史进行整理，对国际译学理论开始关注。她将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和王佐良的《严复的用心》这两篇论文点评为高峰水平的中国传统译论，但对该阶段学者们的翻译学科意识和理论方法，则点评为“经验性感悟为主的前科学状态”。对于这一学科状态，我自己也在《论中国译论的潜学科现状》一文中早如此归纳：“属于‘经验知识形态’，它所依赖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直觉，侧重于体验。译论的先哲们指导译经时着重启发，每每是因事指点，随机接引。所以其特点是零章片

语的语录和注疏居多。它们虽然简明扼要、语多精粹，却不能伴以分门别类、纲维并举的分析性。就其知识内部而言，呈现着散点式的无序状态，……知识内部与外部均缺少逻辑之光的照耀……”

## 第二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初建：1984—1994

张博士把第二时期的起点放在 1984 年是很有道理的，“翻译学”这个概念恰恰是那一年开始频频出现在学术论文之中。1986 年起，更多刊登翻译研究的杂志创刊，翻译方向硕士学位点开始招生；1987 年起，翻译学术研讨会首次召开并逐渐常态化；1989 年起，国家级科研基金开始资助翻译研究项目，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粗具雏形。

这一章的第一节描述了“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粗具雏形”“翻译学学科框架”和“翻译标准构建”三个核心学术事件。第二节介绍了刘宓庆等三位学者在构建翻译学体系各自的代表性成果。在这第一次学科构建热潮中，翻译学曾经或者被置于语言学框架下，或者被置于系统科学、逻辑学、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乃至美学和艺术框架下，此时期的翻译标准研究出现数学化、公式化的分析模式，如吴新祥，李宏安的等值翻译定量分析模式；范守义和徐盛桓分别著述的“信达雅”的模式数学模型等等。

第三节学科状态描述中，张博士敏锐发现学者们在进入 90 年代后相继提出中国译学研究进入了“调整期”“滞缓期”“静寂期”“沉寂期”，甚至走入“死胡同”，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对翻译学学科发展的迷茫和困惑。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疆域拓展：1994—2004

张博士把第三个时期的起点定为 1994 年，因为从这一年起开始出现比较文学和史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谢天振和王宏志的论文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倾向。而张南峰《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一文竟然用了“死胡同”这种激烈的用词提醒当时中国译学应当走出封闭。学者们开始关注国际译学已近完成的“文化转向”并大量译介描述性翻译研究、操纵学派、多元系统理论、目的论、解构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及后殖民翻译研究等理论。谢天振、王宏志、孔慧怡等学者针对中国翻译史料开始进行描述性的译介研究，拓展了中

国译学的研究疆域，完成了中国译学的“文化转向”。

关于学科状态，张博指出这是一个译学观念不断更新也不断冲突的时期，劳陇和张经浩等学者对翻译学学科价值产生怀疑，认为翻译学建设是“迷梦”，是“至今未圆的梦，而且是将来难圆的梦”，认为唯有回到翻译实践才是正途；还有些学者对国际译论的大量引入产生反感，担心中国译学失去自己的特色和身份。因此，学界就“该不该继续翻译学学科建设”“该不该大量译介国际译学理论”展开了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通过正常的学术论争，中国译学界对“翻译学”和“中国特色译论”产生了基本共识：翻译学需要应用理论，还需要描述性翻译研究；翻译学要尊重传统译论的特色，也要正视传统译论的局限，更需要警惕“中国特色论”背后的非学术心态和学术话语弊病。

#### 第四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独立和多元：21 世纪初（2004—2014）

2004—2014 年是中国与国际译学同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译学真正走向独立和多元的时期。翻译学学科建设获得了体制上的认可和支持，翻译人才和翻译研究者的培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译学与国际译学交流频繁，多种研究范式借鉴融合，扩展出多个具有分支学科雏形的学科疆域。

就研究领域而言，本章以“元学科建设”“翻译学基础理论建设”“翻译史与译介研究”“翻译学应用研究建设”“语料库翻译研究”“口译研究”共计六个主题分别在第二节到第七节分别论列。其论述过程精微细致，令人称道。

这一阶段的研究路径也值得高度注意：翻译学呈多种范式共存的局面，除了文艺学感悟路径、哲学路径、语言文本路径、社会学文化路径、心理学认知路径、计算机技术大数据语料库路径，连医学路径（如眼动跟踪技术、脑电图仪、磁共振成像、事件相关定位等）都已经开始进入了译学研究领域。

#### 第五章 当代中国译学新阶段：新任务和新挑战（2015 年至今）

这一章是展示张莹博士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出众见解

的一章。所以，我愿意把这一章的介绍篇幅稍微拉长。第一节探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模式，指出目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接受程度并不令人满意，中国译学在2010年之前又较少关注中国文学外译，这就使得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相关的译介研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当代中国译学的重要主题。作者关注并总结说：

中国的学者已经研究了较多中国文学外译的案例，通过分析翻译策略、翻译模式分析和海外读者调查，总结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外译的经验和教训。不过如何为今后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外译提供策略性建议，具体的个案该如何操作，是否有足够的条件操作，如何寻找中国文化精神和西方读者兴趣的平衡点等问题，依然有得解决且任重道远……

这一章的第二节“产业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研究”中，作者从国际的视角分析了GILT的定义及其中的“本地化”的翻译过程，指出翻译不再局限于线性的文字，还会涉及声音、图像、色彩、空间关系等多维度、多模式因素。作者还精细地关注并探讨了“针对语言服务特别是本地化的研究”，“针对翻译技术的研究”在外域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翻译产业化进程已经起步”等中外历史事实。作者还借鉴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Jim Gray）“第四范式”的社会大变革，深刻指出翻译研究在描述、解释和预测方面都面临新任务和新挑战。

这一章的第三节“数字化网络化时代重新定义的翻译”中，作者指出在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翻译变得无处不在，“无论政治、经济、财政、商业、法律还是教育，翻译开始成为生活本身，这就使得翻译研究必须正视数字化网络化翻译的新特点。这一节的第一小节“翻译形式的多维多模式现象”指出：翻译不再局限于线性的文字，还会涉及声音、图像、色彩、空间关系等多维度、多模式因素。第二小节“译者身份的网民化现象”中，作者独具慧眼地评论说：“通过

使用字幕翻译与观众对话，包括特意使用某些网络热词针砭时弊，甚至在字幕中加入评论甚至聊天（网络用语为“吐槽”），这种做法其实是尝试引起译文读者的共鸣。目前国内很多翻译方向的硕士论文都开始涉及这个话题，但多数都还停留在对该现象的描述层面，缺乏用翻译理论的视角深度剖析这些翻译新现象的力作。”这段评论不是引用别的学者观察到的现象。这十分难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史学”（刘按：是指学识，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学识”的“博”是理想境界）、“史才”、“史识”三长（《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这三才中“史识”，就是识见，义理；即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要能做到“论从史出”。即不能只研究史料，掉进故纸堆里。而要对历史有自己的观点，即“识见”。三才中以“史识”为最难，最重要，因为有才无识或有学无识，都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学者。张莹博士在宏观观察上的“史学”和诸如如上的评论显示出她“史识”两个方面的卓荦，都显示了他总体上的“史才”。这一节的第三小节“翻译过程的译者读者互动现象”认为“网络……让读者通过博客、论坛、微博等网络话语渠道……提出各种反馈和疑问修改意见……翻译成为‘互动式翻译’……”这种对于“超文本”的见解做到高度的“与时俱进”，也是张莹博士的“史识”的例证。

总而言之，这是对于中国当代译学发展史的全景式的展示！夸赞说，这一展示不愧恢宏和雄浑，是丝毫都不算过分的。

### 三、张莹博士专著的少许缺失

顾炎武在其《日知录》第十九卷里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所以轻易地为人作序，轻易地为龟毛兔角类的虚妄、土龙刍狗类的名不副实以及南箕北斗类有虚名而无实用意义的著述无原则地予以揄扬都是不健康的学术现象。而公允平正地为一部高价值指数的著作指出长处，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短处，才是可以获得首肯，避免“人之患”效应的最好做法。那么张莹博士这部专著有什么样的缺失呢？

张莹博士在“绪论”中说：“选取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述，难免挂一漏万。”这一说法是作者过于自谦，而且这个汉语

成语自身也有表达方面过于夸张的不足。我倒是愿意用“某些畸轻畸重的倾向”来概括一下作者这一自谦之语中的合理元素。

纵览书后的 500 余个的“参考文献”，我们可以注意到，有的学者被选取的参考文献多达 20 余个，可是在翻译理论界著述丰厚、卓有声誉的刘军平和刘亚猛的引述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却尽付阙如。

作者在多章里都提到了“讨论热点”，但是对于众多一线学者都参与了了的“归化和异化”的大热点，刘军平认为“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说，“韦努蒂有关归化和异化的翻译观属于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理论，它进入国内”，在国内热烈讨论“至少十年之后。”（刘军平，《改革开放四十年：外国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反思》）。可是这本专著对于这一热点的关注显得不足。

作者在第一章大篇幅地提到了许渊冲的诗词翻译以及“与许渊冲观点对立”的讨论，但是，持“对立”观点的学者却只是提到了翁显良一个人，这就让人有了“未见全牛”的遗憾。热点讨论也包括（尤金）“奈达现象”的兴衰描述，也出现了“未见全牛”的、让人兴憾的局面。还需要指出的是，以许渊冲为个案对文学翻译进行讨论的专著——马红军的《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许渊冲的译学理论与实践》却没有进入这部译学发展史专著的讨论范围之内。说到诗歌翻译，诗歌翻译论文方面的最重要选本之一——海岸编选的《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也未能列入专著的参考文献和学术讨论之内。

对以上缺项的接糍，丝毫不影响对全书的整体高度评价。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中国当代译学发展史的全景式的展示，站在高处，忽略了若干细部，也是情理之常。这也可以用“大醇小疵”“白璧微瑕”和“瑕不掩瑜”之类的传统成语给予解释。希望的只是张莹博士在本书再版时考虑如上的谏言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元素，如果有，那就有针对性地改进升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有感于一部大制作的水到渠成，我有一首七言诗献芹于张莹博士，藏头诗一首（评张莹博士《当代中国译学发展史（1979—2019）》）：

张旺<sup>①</sup>得时展史才，  
莹<sup>②</sup>其疑也拨云开。  
卓然林木雄浑里，  
莘莘<sup>③</sup>巍巍览壮哉！

以上评价以及诗词的得失，均希望张莹博士和广大读者不吝金玉，多多赐教！

2020年6月17日于深圳

---

① 张旺：又为“张王（读去声）”，意为“壮盛”，如韩愈“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骞”。

② 莹：作为动词，意为“使明洁、觉悟”，如江淹“点翰咏新赏，开帙莹所疑”。

③ 莘莘：发音为“洛洛”，意为“明显”。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起步：1979—1984 .....	7
第一节 当代中国译学界的形成与起步 .....	8
第二节 中国传统译论的代表性成果 .....	21
第三节 经验性感悟为主的前学科状态 .....	32
第二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初建：1984—1994 .....	39
第一节 当代中国译学的第一次学科构建热潮 .....	39
第二节 第一次翻译学构建热潮的代表性成果 .....	55
第三节 应用性译论为主的应然学科状态 .....	67
第三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疆域拓展：1994—2004 .....	76
第一节 当代中国译学的文化转向 .....	77
第二节 拓展译学疆域的代表性成果 .....	94
第三节 译学观激烈冲突的学科拓展状态 .....	114
第四章 当代中国译学的独立和多元： .....	126
21 世纪初（2004—2014） .....	126
第一节 当代中国译学的独立与多元 .....	126
第二节 当代中国译学主题一：元学科建设 .....	138
第三节 当代中国译学主题二：翻译学基础理论建设 .....	159
第四节 当代中国译学主题三：翻译史与译介研究 .....	175
第五节 当代中国译学主题四：翻译学应用研究建设 .....	183
第六节 当代中国译学主题五：语料库翻译研究 .....	192
第七节 当代中国译学主题六：口译研究 .....	202
第八节 多范式多边界的独立学科状态 .....	206

第五章 当代中国译学新阶段：·····	214
新任务和新挑战（2015 年至今）·····	214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策略模式研究·····	214
第二节 产业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研究·····	222
第三节 数字化网络化时代重新定义的翻译·····	227
结语：历史与未来·····	232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75

## 绪 论

当代中国译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学者不断地思考、质疑、借鉴和探索下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从潜学科到学科独立并日益走向繁荣的过程,同时它也是译学观念激烈冲突与演进的历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计算机技术与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译学又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与机遇。此时系统梳理中国译学的发展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它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本书力图达到的目标。

目前与本专著类似的中国译学整体发展史研究基本止于 2009 年,包括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2000)、王秉钦的《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第二版)》(2004)、Leo Tak-hung Chan(陈德鸿)的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Modes, Issues and Debates* (《20 世纪中国翻译理论:模式、问题与论争》)(2004)、李林波的《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2007)及许钧和穆雷编著的《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2009a)。

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2000)从中国最早的译事及零星论述开始,以代表人物的翻译思想为主线,将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分为古代译学、近代译学、现代译学和当代译学理论四个阶段,但由于写作时间的限制,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翻译研究,仅用 14 页篇幅粗略涉及 1988 年前的翻译研究。作者自己也承认这只是“鸟瞰式的快速扫描”,在书后“余话”中遗憾地提到:“本书原计划在最后一章谈谈对中国译学理论发展趋势的展望和预测,以及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管见等等,但是几度掷笔,老写不好,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写不出时不硬写。”(陈福康,

2000: 472) 这种困难显然与该作者完稿之时中国译学研究还处于潜学科状态密切相关。

王秉钦的《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第二版）》（2004）研究范围是整个 20 世纪的翻译思想史，大部分篇幅放在“近代”“五四新文学时期”“40 年代”“新中国初期”，对 1980 年以后的“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只用了 20 多页的篇幅，线条也很粗略。不过该专著首次描述了中国译学观念的冲突，如关于“翻译是一种艺术”还是“一门科学”的论争、20 世纪末关于是否存在翻译学的论战和“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还是普遍翻译学”的论争等。

香港学者陈德鸿（Leo Tak-hung Chan）的英文专著《20 世纪中国翻译理论：模式、问题与论争》（2004）也是以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译论为研究范围，编译了 38 篇翻译论文。虽然第一部分有 4 篇论文综述了中国译学的发展，但脉络非常粗略，选译的中国当代翻译思想占很小的比例。

李林波的《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2007）梳理了中国译学从 1981 年到 2003 年的发展。该专著介绍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和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与继承，将中国译学的研究范式归纳为语言学模式、文艺学模式、文化模式，梳理了几十年来重要的学术论争（科学与艺术之争、理论与实践关系之争、翻译学成立与不成立之争、特色派与共性派之争、归化异化之争等），并重点评述了 3 部翻译学著作。此书对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描述清晰，但因出版时间所限，未涵盖 2003 年后发展最为迅猛和纷繁庞杂的译学观点与成果。

许钧和穆雷编著的《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2009a）属于“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系列，应该是迄今当代中国译学研究中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译学发展编年史著作。该专著着重宏观的统计和综述，将 1949—2009 年间翻译研究成果分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史、应用翻译研究、其他”四大类别，分别统计论著和论文的数量，突出展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国译学的迅猛发展。该专著还统计式描述了 60 年间中国译学的会议、博士论